

# 在精神召唤与历史变革的激流之中

——重读周立波长篇小说《山乡巨变》

□张高峰

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是周立波继《暴风骤雨》后又一部长篇现实主义力作,小说由上下两卷49章组成。创作时,周立波落户家乡湖南省益阳农村,在此期间积极参加山乡农业生产劳动,与广大乡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可以说,这部作品凝聚了作家深刻的现实农村生活体验,建立于他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浓厚的经验基础之上。

农业合作化时期,作家重视乡土生活的切身体验,积极融入到农村生活实际,获取文学书写的经验。作家赵树理、周立波、柳青等,都具有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长期与农民吃住劳动在一起,目睹着发生在农民身上的变化。周立波于1954年10月在湖南益阳市郊桃花仑竹山湾居住,并担任了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他再次返回桃花仑,任益阳市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组织并积极参与山乡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汗水与泥土中与当地乡民一起从事劳动生产锻炼。周立波深刻体会到农民心理情感的变化与波动,以及根深蒂固的传统保守意识的复杂纠结,这些都为他创作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提供了丰厚而真切的素材。此外,《山乡巨变》还以其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风情特色与艺术性结构语言手法引人注目,这也是周立波以文学创作深入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扎根人民群众集体之中,见证宏伟历史进程的自觉努力。

小说《山乡巨变》中,1955年的初冬,县委积极推进农村办社工作,委派团委副书记邓秀梅担负起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任务来到清溪乡。她在解放初便积极参加工作,凭借着吃苦耐劳的精神,逐渐成长成为一名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出色干部。在邓秀梅与当地干部的积极推动下,农村生产合作化运动艰难而坚定地清溪乡发动开来。但由于部分农民受到传统观念束缚,仍然存在根深蒂固的私有思想和陈旧旧习,加之背后势力的挑拨离间故意造谣破坏,严重地阻滞着合作化运动深入开展。兴办合作社需要争取广泛的群众认同和支持,而其中属于“中间人物”的陈先晋、“亭面糊”盛佑亭、“菊咬筋”王菊生等老式农民,如何争取他们入社、改变其思想观念,是小说描写的重点。

被人们戏称为“亭面糊”的盛佑亭解放前是一个贫苦的农民,解放后分了田地与山地,他对于党的农村政策深怀感激之情,但是思想上私有意识的根深蒂固,也使他对于合作化充满着犹疑,也会听信谣言担心竹子归公就砍竹子上街卖。陈先晋是村中田地里数一数二的老当家,也是民兵连长陈大春的父亲,他不爱说话却异常勤劳,解放前佃地种田地种肯吃苦耐劳、受尽剥削,翻身分得田地后,他墨守成规又对入社充满偏见,思想上保守而固执。陈先晋一直想坚持私有制田地单干发家,在全家人的力劝声中他才勉强同意入社,而受到王菊生的蛊惑,又思想动摇放弃入社,传神地呈现出对老一代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农村改造的艰难。中农“菊咬筋”王菊生担心入社吃亏,用尽心思阻碍乡委干部劝他入社,固执地想依靠自己的家产和单干实现个体化的发家致富路。“秋丝瓜”张桂秋和“符癞子”付贱庚对入社也心存不满,听信谣言耕牛入社折价低,两人在山里趁夜色杀掉耕牛。潜伏下来的反革命阶级敌人龚子元和他的党客,在乡民面前装老实,暗地里煽风点火,想尽一切奸计妄图破坏清溪乡农业合作化运动。清溪乡农业合作化推进过程中,因为思想保守、行动落后的村民以及反革命分子蛊惑人心的蓄意破坏而充满着



艰辛曲折。邓秀梅与清溪乡党支部书记李月辉、民兵连长陈大春、上村互助组组长刘雨生齐心协力,直面农村办社工作的困难和矛盾,依靠党组织的强大力量,扩充新生力量,吸纳盛淑娟等积极分子成为团员,组建合作化宣传工作队,积极宣传合作化的优势,并调动妇女参与农业合作化生产的力量。邓秀梅与清溪乡干部深入了解农民的顾虑,反复到他们家中和他们促膝长谈,水滴石穿般教育、转化他们保守的思想认识。经过耐心不懈的努力,落后农民逐渐认识到合作社的优势,打消了原有顾虑,盛佑亭、陈先晋等都自愿加入了合作社。

在邓秀梅和李月辉的领导下,清溪乡支部在全乡建成了五个初级合作社。而后,随着党领导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清溪乡的青壮年初级农业社,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建成了高级社,刘雨生被选为社长,因工业建设需要,邓秀梅、陈大春等被调去株洲,陈孟春、盛学文成长起来参与到合作社的工作中。合作社并未强制决意单干的张桂秋、王菊生入社,而是通过农业合作化集体生产,力争丰产来彰显合作化的优势。张桂秋、王菊生虽然拼尽全力解套,还是败下阵来,集体的力量与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巨大优越性使他们转变了观念,都自愿加入了合作社。隐藏在乡乡的恶霸龚子元和他的姨太太,与国民党特务联络准备暴动的图谋被发现,落入法网。

## 二

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从乡村现实生活经验取材,书写农业现代性的追求与农村的时代变革图景,在历史化的文学实践过程中,以栩栩如生的笔法,为当代文学塑造了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这与作家周立波长期的农村生活体验息息相关,他对处于重大历史变革时期的农村情态与农民为之波动的心理深为熟稔,并极为重视叙事过程中生活细节的表现力,从而形之于笔,所呈现出的人物形象可信可感。我们在书中不仅可以看到如邓秀梅、李月辉、刘雨生、陈大春、盛淑娟、陈孟春等积极投身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先进人物,也可以看到作家倾注极大笔墨所塑造的“中间人物”如“亭面糊”盛佑亭、陈先晋等,及落后典型人物如“菊咬筋”王菊生、“秋丝瓜”张桂秋和“符癞子”付贱庚等,丰富了当代乡村叙事的人物形象世界。

《山乡巨变》中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改造过程涌现出的新人形象,尤为引人注目。刘雨生的成长,可谓涵盖了艰辛百味。作为一名农村基层乡政府合作社骨干干部,他一心为公,心地纯良无私,熟知“村里的每一块山场,每一丘田,每一条田塍的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他是清溪乡的一本活的田亩册”,他全身心扑在农

## ■短评

在陕西当代文学的图谱上,都市女性书写一直非常薄弱。一方面,这缘于地处西北的闭塞保守与都市文明的不发达,另一方面,与关中强劲的大男子主义以及女性意识的孱弱也息息相关。可以说,女性在“陕军”中一直受制于父权派给予的命运,被宏大的书写所遮蔽。就此而言,“70后”女作家周瑄璞的都市女性书写具有重要的意义,她的书写更关注现代都市女性的心灵主体和生存境遇,揭示隐性的、结构性的力量在女性生命存在与日常生活中的主导和牵拽,具有“自传社会学”和心理现实主义的特征,从而使得陕西文学的版图更为圆整和丰满。

在长篇小说《多湾》中,周瑄璞出色地塑造了中国版的“乌苏拉·布恩迪亚”或“女白嘉轩”,这位坚韧而又顽强的女性,托起家族的繁衍,引导后代不断地蜕变、觉醒与成长,最终剥离乡土,走向城市,深刻地展现了20世纪中国普通女性求索、奋斗与裂变的精神历程,是一部波澜壮阔而又细腻饱满的女性成长史诗。中短篇小说集《隐藏的力量》则聚焦在平实生活轨道里重复日子的现代都市女性,透视她们的情感、婚姻、焦虑和屈辱,捕捉她们微妙复杂的情绪,洞悉她们心灵的微波和灵魂的皱纹,更可贵的常常揭橥女性在偶然的考验面前迸发出预料不及的光彩,照亮了人性的幽暗和命运的神秘。

《隐藏的力量》中的女性遍及都市的角角落落,她们有36岁已如白头宫女,回忆咀嚼前尘往事,感慨造化地弄人和岁月的无情——“我年轻时很傻,现在不太傻了,却不再年轻。”有16岁就闻名全厂的“厂花”于津津,然而“世界如此荒诞,女人似乎全凭一张脸”,尽管“她的身体,只为爱情开放,偶尔不得已

时,她向金钱和权力敞开心扉,换取女人在人世间的行走,她像对爱情一样对待它们,真诚而从容”。但爱情并没有像树一样深深扎根,却常常为情欲而情欲,婚姻和情感的变化,如同暴风雨一样来不及提防。相伴到老的誓言,最终了无声响,甚至换来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有困厄于妇科病房的中年女性,在世俗生活的一地鸡毛中冥想生死和见证人性。有女性可怕的同性的嫉妒,有姐妹之情的微妙变化,有自负女性的回音反思,有文艺女中年理性而节制的偶像崇拜,有母女之间的幸福与忧伤……这些女性,都在与岁月、生活和命运抗争,正如小说《隐藏的力量》中所言,“对女人来说,这是和命运抗衡,更是和曾经的耻辱较量,用以卵石击天的天真,带着老虎吃天的无奈,有着如坐针毡的慌张和迷乱,一步步走来,一点点积蓄弱小而迷人的力量。”给这些女性生活带来荣光的,“是热烈地求索正确的生存之理由,是穿过无知、偏见和欺骗的黑暗,在变化着的、灼热的情欲之光下探索,是拿幸福或死亡,尊严或羞耻去冒险”。对于她们而言,“既承认她们的身份是一个自主的人,又承认她们的女人的命运”,无疑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仅是现代都市女性,也是我们所有

《山乡巨变》中,作家以生命体验的真切感受,凝结满腔热忱的希冀,抒发乐观坚定的理想信念,献出了对于社会主义历史变革的一曲由衷的赞歌。

业合作社的发展上,对于工作尽心尽力,深受村民的拥护。为了有效推动消极落后农民积极入社,做通他们的思想工作,刘雨生不厌其烦地上门到家,耐心听取他们的想法意见。可以说,刘雨生成为了故事的核心人物之一,在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力上被作家塑造为基层先进干部,代表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乡村基层干部勇于担当守责,积极响应党的伟大号召,带领人民群众不辞劳苦创业的光彩形象。

## 三

在艺术上,《山乡巨变》的语言自然清新,善于运用方言口语,营造浓郁的乡土文化氛围,充满地域文化风情特色。周立波在保留典雅细腻笔触的同时,也自由地使用着湖南山乡富含生活气息的方言俚语,极大保留了湖南乡间生活的本色。周立波格外注重叙事语言形式丰富的表达力,这也成为他的文学创作突出的艺术特质。在助力刻画人物形象的语言上,他深下了功夫,经其提炼润色之后,那些方言口语获得了独特的气韵韵味,其语言传达达意,有效地呈现出特定地域文化特质。对于时代变革中焕发新生的生机的山川大地,周立波怀着难以抑制的内心激动,他跟随历史精神的召唤,用凝于心尖的泪与笑,镌刻出一个个激荡时代中前行的身影。

周立波对于叙述语言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追求,他刻意在文中广泛使用方言俚语,避开了普通话用字用词的熟悉感,极大地保留了乡土民风民情的原汁原味,借助那些自乡间山地上生长起来的方言口语,进入到山乡农民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语言形式实则也是一种心灵的形式,由此,人与人之间的声息与联系有情有味地传达了。如在人称指代上,周立波没有使用惯常的普通话称谓,而是极为娴熟地使用湖南益阳方言中的相应人称指代词语,如“堂客”“老驾”“胡子”“老官”“后生子”等,最大化地烘托出湖南山乡生活气息。再如,文中经常出现一些俚语、口头语,如“眨眼皮”“四海”“溜沟子”“霸蛮”“越口”等等,无疑都源自山乡农家田地的日常生活,极为生动地呈现出当地的文化风情,使小说叙事建立于更为广泛深刻的真实性根脉之上。

周立波在《谈创作》中曾写下,“从事创作的人最重要的条件是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对于人的广泛的深刻的观察”,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创作并诞生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开展的过程中,而周立波所擅长的抒情笔法,更让小说充满了深厚的内蕴与语言生机。作家以生命体验的真切感受,凝结满腔热忱的希冀,抒发乐观坚定的理想信念,献出了对于社会主义历史变革的一曲由衷的赞歌。

# 抗争现代女性的宿命

——评周瑄璞中短篇小说集《隐藏的力量》 □王鹏程

人面临的难题。

对处于现代都市的女性作家而言,最难的就是面对生活,如何捕捉“生活的常态”和“生活的核心”。周瑄璞无疑善于捕捉“生活的常态”和“生活的核心”,善于把握现代都市女性的生理生活与心理生活。她的小说,如同从生活中撕下的一角,她笔下的女性,大多没有完全丧失自我意识,处在他人、环境和命运的摆弄之下,但又想通过限制和异化自己的环境,改变生活和命运,因而形成了“反抗性的依靠”的心理。我们很容易被她的主人公感动,就像直接被生活感动一样。同时,她又毫无保留地呈现自己面对时代困惑的态度:爱,如何去爱,如何面对无所求的爱、自私的爱,如何面对爱中的尊严和屈辱。这是“力量的力量”,是坚不可摧的生活真谛,也是拯救我们的惟一力量。但在《隐藏的力量》中,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很难被当作主体,作者的女性观念与个人梦想之间,也暴露出无法弥合的裂痕。因而,更重要更关键的是,让女性不再局限于同男人的关系,有自己的独立生存,成为与男性平等的独立主体,并且坚信——“根本没有女人这回事。如果我们努力实现这种愿望,即

# 奏响壮丽的生命之歌

——重读《把一切献给党》 □全展

战争年代,吴运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精气神,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新时代,我们理应坚守初心使命,立足岗位,改革创新,建功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切。



金的精神来勉励自己:“应该不愧为他的一个朋友和同志”。于是,他一边顽强地与伤残作斗争,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钻研军工技术,把实验室搬进医院,研制出一种新的高级炸药。出院后,这位学会了打仗、学会了造枪造炮的忠勇的战士,又服从党的需要,在实践中学会教书,为人民解放斗争培养技术人才。

《把一切献给党》在写作上也有其鲜明的艺术特质。全书都用第一人称,读来犹如亲耳聆听传主讲述激情燃烧的岁月生活。自传有时介绍制枪炮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其惊险程度让人为之汗出;有时直接阐明传主(“我”)的观点,显示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思想光辉。两者交错反复,形成起伏的波澜,增强了艺术张力。作品不仅着力描写传主的可贵行为,而且还十分注意刻画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使人感到真实质朴、有血有肉。如记一次拆除八颗大定时炸弹的经历,极具宛转曲折之妙。面对第一次遇到的庞大的美国怪物,“忽然,我的心怦怦乱跳,眼看着这巨大的炸弹,好像立刻就要爆炸,我立即就要粉身碎骨了。两条腿不知不觉地从弹坑里往外走”。洞口吹来的一阵凉风,使吴运铎的头脑清醒了。他“对自己这种举动奇怪起来:炸弹在坑里,我跑上来干什么?——怕死吗?”“如果我不拆,就得别的同志来拆,不是同样也会碰到危险吗?临阵脱逃,不仅是懦夫,而且卑鄙。死又有什么可怕?活着就要完成任务,死了就算革命到底!”经过一番思想搏斗,吴运铎又恢复了镇静,充满了信心。终于,经过危险的几个小时,他拆掉了炸弹上的全部信管,取出的炸药就有700多斤,为制造炮弹补充了新的原材料……

面世近70年的《把一切献给党》累计发行1500多万册,至今热力不衰,魅力依旧,不仅发行量巨大,而且被先后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拥有话剧、广播剧、报告剧、越剧、歌曲、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重塑这段感动和激励着亿万人民的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作为少年的我第一次读到了《把一切献给党》这部脍炙人口的英雄传记,便为传主吴运铎九死一生、波澜壮阔的前半生所感动。如今重读这部红色经典,我更加向往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精神、无私的献身精神和不息的奋斗精神。在《把一切献给党》中,吴运铎写道:“我们要永远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把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交给党吧!从人民和党那里,我们将获得无穷的力量,去移山倒海,开发矿藏,修建水闸,征服沙漠,把我们祖国建设成美丽的花园。”吴运铎说得好:“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全心全意在所不惜”。战争年代,吴运铎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精气神,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奏响壮丽的生命之歌。新时代,我们理应坚守初心使命,自觉为党旗增辉添彩,立足岗位,改革创新,建功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切。

一位女性某天能够任其所愿地成为她自己的样子(当然,成为家中天使也包括在内),那么,对于她来说,也许除了最好成为她自己想要的样子之外,她什么都不想。”这时,女性才可能成为完全的人、完整的人,有性别而不惟性别人,用蓝波的话说——“那时,对女人的无限束缚就是戾然而止,她将会在自己身中并为自身而生活,而男人,尽管至今是可憎的,将会让她获得自由。”

周瑄璞是冷静的善于捕捉心灵悸动的现实主义主义者,她的现代都市女性的心理现实主体书写细腻、浑熟、有力,她关心女性个体的命运,将人物置身于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冲突对抗的困境中,敏感、犹豫、迷茫、焦灼、低俗、颓废甚至歇斯底里,有着新写实主义的坚实,同时又自然衬托出人性的复杂以及崇高的多面。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她的小说太自然,她的感情没有找到更成熟、更宏阔、更超越的形式来予以承载。从她小说的泳池跳出来以后,我们固然看清了女性生存的真相,情感和心灵上也经历了冲刷和洗涤,但我们生活和灵魂中国有的东西并未拔根而起,更深刻的思考似乎也不能绵延下去。此外,她的小说有时用力过猛,没有蕴藉。小说固然要道出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同时也得留下自由探索的空间,正如中国画的“留白”一样,这是读者参与作品与作者交流的通道,也是读者自由实现的前提。不过,这些并无妨碍她现代都市女性书写的致密深刻,以及穿透现实直刺人心的冲击力,我们只是希望她的女性世界更为浩瀚和深邃,她已经显露出了繁密幽深的可贵气象,并走在勤勉前进的路上。